

南召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无名英雄陈发光专辑



● 陈发光回忆录

● 九死不悔录

政协南召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南召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南召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前 言

陈发光同志(1921·9·5——2001·12·8)，南召县白土岗镇人，1938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冒险犯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坐牢，受尽十种酷刑，仍坚贞不屈。解放后三次蒙冤判刑入狱，忍辱负屈。1987年平反，广东省国家安全厅恢复了他的公职，并于同年元月离休，定居新乡市。1988年10月被国家安全部褒奖为“无名英雄”。

研读陈发光同志追述历史的回忆录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江延俊同志秉笔直书的《九死不悔录》，我们不禁被发光同志半个世纪的曲折、艰险的经历实录所紧紧吸引，被他半个世纪忠勇精神顽强信念所深深触动。“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发光同志作为一名在党的隐蔽战线默默奉献的老兵，九死一生，无怨无悔。他以一种平常心，平和、平静地回顾自己被卷入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旋涡回流，面对本该铭刻于心的忠而获咎的委曲，他没有埋怨什么人，也没有仇恨和敌视什么人；既没有胜利者的高傲，也没有被伤害者的怨恨与牢骚，只是由衷地赞叹改革开放后的实事求是政策，深深地感激在他身处绝境时给予他帮助的人。我们赞赏发光同志这种对党对人民的高风亮节和襟怀气度。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我们党的事业中，隐

隐蔽战线的工作是一个特殊的岗位，不少出色的人物，如潘汉年、张公干、韩克俊等，都有过被冤屈的遭遇。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80年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专门讲过要写小人物，写无名英雄的意见。他说：“有名英雄好找，没有无名英雄就没有有名英雄。我们要发掘无名英雄的资料。……千万不要忘记无名英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我们编辑出版这期陈发光专辑，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无名英雄的典型范例，特别是给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进行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树立一个学习楷模。同时也给后人研究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历史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于弘扬南召革命老区前辈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无私奉献精神，对于南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编辑出版本期文史资料，得到了中共南召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和县政协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还有政协新乡文史委领导同志和陈发光、江廷俊等同志提供资料照片，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我们编辑过程中，陈发光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谨以此书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

二〇〇二年三月

目 录

一、陈发光回忆录

童年遭匪患	(1)
红军路过白土岗	(5)
入党前后	(8)
在清剿中被捕	(10)
十种酷刑致残	(12)
死讯的考验	(17)
押解洛阳	(18)
初进集中营的日子	(29)
坐内禁闭时的两件事	(33)
狱中难友和教官	(37)
我们都是政治犯	(42)
在新乡结识王志祥	(45)
派赴香港筹建情报站	(48)
王志祥与商震	(50)
三反五反蒙冤被判刑	(54)
在北京被抓捕	(56)
我也得说违心话	(58)
终生难忘的好干部	(59)
安居新乡 告慰老友	(62)

二、九死不悔录

——记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陈发光	江廷俊 (63)
-----------------------	----------

一、少年时期	(63)
二、参加革命	(64)
加入共产党	(64)
选送中原局党校学习	(65)
发展党组织	(67)
三、被捕坐牢	(69)
受尽酷刑 身残志坚	(69)
上解第一战区长官部	(71)
西北青年劳动营	(74)
四、隐蔽战线	(77)
在新乡倒卖国民党军火	(77)
在解放战争中搞策反	(79)
在广州负责秘密招待所	(81)
五、三次蒙冤	(84)
广州触礁	(84)
北京沉船	(86)
南阳又加刑	(89)
苦难生活	(91)
六、拨乱反正	(92)
广州中院彻底平反	(93)
南阳中院两次改判	(94)
恢复公职	(98)
授予“无名英雄”称号	(99)
七、革命者的风范	(101)
创办企业，克己奉公	(101)
诚以待人，严以律己	(102)

陈发光回忆录

童年遭匪患



陈发光 1998 年
平反后摄于新乡

我的家在南召县白土岗，1921 年农历 8 月 4 日出生。由于旧社会的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兵匪一家，国无宁日。在我八岁的时候，便被土匪绑票，我跟随土匪到老河口，过丹江，又到四川白河县，进陕西赵川、龙驹寨等地流窜，前后历时一年半，受尽磨难，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土匪小头目，名字叫魏国柱，还有个匪首叫老王太，还有一个师长叫李长有，原来都是建国军的人。一次吃饭，我一不小心将碗掉在地上，摔打了，不想这犯了土匪的忌讳（打碗锅，筷子担在碗上等）立即被拉出去枪毙。我见他们举起枪，连忙倒在地上，同时枪响了，子弹离头一尺远，居然没伤着。土匪举枪又要打，团长张凹斗，从对面过来，动了恻隐之心，说：“算了，拉回去吧，已经祭奠过，饶了他小孩家。”我这才拣了一条命。我母亲当天晚上从水道眼逃走了，我弟弟太小，土匪给放了。

我跟着土匪到了黑庙村住在那里，铺上席子，下用玉米籽垫地，肉票们一排排坐下，也不捆，自己报数后，让家里人去赎。那时有钱的用钱赎，没钱，买点手电灯啦，皮帽、四季帽啦，子弹啦及别的军用物品都可以，现洋更好。

父亲买了顶皮帽子去赎我，半路上被出沒的土匪給抢去。父亲哭天沒泪，回到家就病了。土匪押住我們继续往湖北流窜，先到邓县。

在邓县连盘混街楼，老王太闹騰得很厉害，弄得十室九空，地广人稀，草深没人，野兔成群。

土匪过路，二三十路纵队，不是牲口倒下便是人倒下去，一倒下被踐踏后，便难活。我不幸掉入路沟里，大声喊：“救救人吧！”有一个人顺手把我拉上来，夹在人中间，被挤得好像脚不沾地往前走了一里多地。

离老河口十五华里处，有个光华县，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兵匪大战。一方是刘峙的开车，一方是土匪的十万之众，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别廷芳的三个团都被土匪击潰了。土匪打起仗来，也有股不要命的劲头。正月里，土匪团长张凹斗赤臂上阵，猛打猛冲，居然将穿灰军装的开车击潰，并夺走他们三挺重机枪。开车子弹多，装备好，用的都是大盖枪，就是最坏的，也是汉阳造。土匪的装备，那就差多了，乱七八糟，张凹斗团是个手枪团，以短枪为主。张凹斗这个人，个子不高，黑脸膛，眼睛大大的挺有精神。这一天，我在光华县躲避，坐在墙角，同伙死了两个伤着一个，我身上的棉衣穿了几个枪眼未打着肉。

土匪押着肉票往丹江走，我手提篮子，里面有几条鱼掉了，又去拾，大人们叫我别去拾了。头天下午，逮了四个人票，土匪用凳子叉住他们的头擰在地上打，看你有钱没有钱。有个20多岁的青年，很硬，回答说没钱。土匪说：没钱枪毙。青年回答，枪毙就枪毙，走出门外害怕了，说要去弄钱。土匪不耐烦，一枪将他打死了。这个青年长得很利靚，还没成家，死了可惜了。又一个青年拉过来，土匪如法炮制，见没钱，又要枪毙，我赶快求情，喊：“叔叔别枪毙他，他脾气犟。”（平时我习惯喊土匪叔叔）土匪见求情，顺水推舟说算了，即放起关在一个屋里。

过了一阶段，土匪给大人一支枪，让他们也当土匪。

次日，过丹江。当时江水很大，人多船少，渡船人太满，半途翻船落水淹死者，当不少于数千人。土匪把肉票拴成一串串，涉水过江，水深处见被淹死者便割断绳，让水冲走。我拉住一个牲口的尾巴，牲口会浮水，靠马尾巴求助，才过了丹江。大人们都淹死不少，我八岁小孩没有淹死。

土匪抢劫民女的事，是很轰动的。白土岗大街上，有个地主养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十八岁到二十岁，一个赛似一个，他请建国军守寨。结果建国军的三个连长看中这三个姑娘，想娶为妻，但是，老地主不同意。

一里以外，有支土匪队伍，建国军与之里应外合，让土匪打建国军，劫持了三个姑娘，带着部队投奔土匪，也不当建国军了。三个姑娘拴在马上，主要是怕从马上摔下来，前后栓，跟着土匪走了。沿途打家劫舍，烧火点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逮住牛、猪等牲口，一枪打在脑门上，打死牲口，割了腿就走，猪打死也是割下腿。据我表舅说这支土匪到四川后，被蒋介石收编了。

过丹江的是正月，我的棉衣都湿了，只好脱光衣服，赤着身子走了十五里路。到了村里边，土匪点着柜子烤火，找了些衣服，不分男女，让我胡乱穿上，弄了些肉让我吃，由于没有盐，所以不能多吃。

到了四川白河县，又折返回陕西，这里山高入稀，山势艰险，住在赵川县一家三弟兄的屋子里。这地方人很穷，种山地，打绑腿，防蛇咬，防挂伤，用白布缠着腿。人是性命，来到世上不容易，肉票没钱，土匪便开枪杀人，杀了总有几百人，可以说是如草芥一样，不被看在眼里。我是能讲请便讲请，一见土匪举枪，忙叫：“叔叔，别杀他了，……”，这样的话，有时也起作用，总计救下的人，约有几十个，但也是九牛一毛。

后来子弹缺了，让人跪在河沟里，用石头砸死，这是管票人押

质官的主意。陕西人性子倔、土、憨，不会花言巧语，挨打也叫痛，只是不会求饶，这就吃了大亏。我在土匪里，给土匪找票推磨。土匪有一半吸大烟，有时候没烟，就找烟灰吸，即二遍烟，找半碗够一个人吸。土匪头子见死的人太多，让放些人。我让一个大个子富态的肉票逃走，他怯生生的走了。这地方，老百姓都跑了，土匪便拣好房子住，十三间房住一排。晚上土匪听见后山洞有人声，便在第二天去挖，抓住三十多个人，又找小山洞，土匪叫我去找。我见一个小得仅能钻进去的小洞口，也不敢进去，拿着手电筒遍洞乱照。我知道，百姓手里拿着镰刀，谁进去就先杀了谁。在这个洞口，我探头看了看，见里边有水，也有人。便回头对土匪说：“叔，里边没有人。”土匪离得较远，就走了。

在赵川住了几个月，家里捎来信儿，第二次要赎我。我的两个舅爷带了五十块现洋，蒸在黑馍里头，找到本村唐占魁将钱转给了姓侯的一个排长，土匪就将我这个一年多的小肉票放了。舅爷把我扮成小女孩，戴花帽，也是因为没有男孩衣服。次日顺利通过十八盘关卡。走了十天，到了别廷芳的地盘，即著名的宛西自治之乡。

宛西自治虽严，但是主观随意性太甚，缺少法规，无论轻重，当权者一句话，一条命就完了，失之过严。但比土匪滥杀无辜还是好多了。

别廷芳治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要是确凿证据的罪犯，不用审判，拉出去就枪毙。

我过一个叫马山口的古镇时，一个小孩掰了两穗玉米棒，被别廷芳知道了，叫人枪毙了，尔后暴尸让人看。处决前也有人劝，说年纪还小，要求饶孩子一命。而别廷芳厉声道：“这么小就偷，长大了还得了？”

这也是个逻辑。别廷芳的自治，在中国也是一绝，历史上很有名。有两个坏人，拿了两块砖当烟土，到典当行行骗，包了几十层

纸,揭开后,不是烟土,是砖。别廷芳命令将这两人就地枪毙,而且限两小时之内,其震慑力可想而知。他们还实行连坐法,出了事大家都陪。因此,牛放在地里,犁放在地里,都十分安全,晚上不让闭户。

别廷芳自治有其独特处,国民党派有县长,别廷芳负责发薪,但有条件,不能管地方的事。他开有兵工厂,在一个叫豆腐寨的地方,将山体挖空,到汉阳去拉水,炼钢铁,造汉阳枪,造子弹,造小钢炮、手榴弹、步枪、冲锋枪。还造梯田,发展农业。

我的两个舅爷和邻居赵二哥悉心照料着我,走了十几天,才回到我的家,结束了一年多的肉票生涯。但这段苦难记忆,是永远不会忘的。

红军路过白土岗

1936年红军从我们家乡过,当时我还上小学。听说这支红军长征到新疆又返回到江西,在江西站立不住,又从江西去陕北会师。从湖北去陕北路经南召白土岗,没有进街,从白土岗南坡根过去。当地听说有数千人,是冬天,大部分没有穿棉衣,都穿几条裤子和布衫,有的穿大衣,有的身披单子和薄被。有不少人穿着布袜和草鞋。当时红军那么苦而纪律特别严明,路上公买公卖,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在白土岗街外,菜地拔几个萝卜,在萝卜坑里放一块现洋(银元)。老百姓尤其穷苦人,对红军的印象特别好。红军路过的大村庄的墙上都用毛笔写很大标语,黑墨字。我还亲自去看过,大意是推翻资产阶级、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穷苦的人联合起来向地主富农斗争,争取共产者平等的权利。红军晚上住在离白土岗十五里的双庙村,村上的地主兼保长总以为不论什么军队到他那里,都是他去接头,部队武装和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官官相卫。可是红军他不了解,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还照老路走。他自称

是村上富翁大户又兼任乡保长。可是红军最恨这种人，经过他一番自白后，就把他扣押起来，把他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和家中的东西分给穷人，当天晚上就把他的喉咙系用刀割断，当晚就断了气。自从红军经过那里以后，革命的火种就扎下了根，慢慢的发展壮大。

我的家乡白土岗街，是区公所、乡公所驻地。南北有山，北边山大南边山小。两边山上都是栗树，是山蚕食场。山蚕吃此树叶而长大成茧，也是农民副业生产的财富。南召、鲁山县绸也很著名。白土岗街寨北是白河，河不算小，全年都有河水，是山水河。河沙是白色，夏天河水涨时水是浑的，平日水很清，可以看到底。河的发源地离白土岗百多里，夏天雨水多，河水涨很大，河水浪头震耳，街南边也有大水，很怕人。白土岗像只大船，南北西边水涨到寨外，而水不进街。南北均可行船，每年夏天南阳、湖北的帆船上千只，到白土岗装煤和柴，运到南阳及湖北地区。解放后五十年代在南召鸭河口修了个中型水库，在南召南阳之间，从此把河卡断，帆船不能到白土岗了，减少了白土岗的热闹繁华。白土岗地区山多水多，能种的土地很少，每人不到一亩。解放后由于白河水源好，所有土地，除山坡地外都改成水田。夏天种稻谷，冬天种小麦，天再旱，不怕，修有白河渠，白河渠自动浇田，人们不怕天旱。白土岗街有五百多户人家，每两天一个集，逢集外地四乡都来赶集；每年二月二有大会，一般三台大戏，很多玩艺，如上刀山、玩洋戏、马戏团，很多民间艺人来赶会。每年提前半个月，周围二十多里的各种手工业者如修秤的、做鞋的、倒锅的就来了。有数十桌赌场，还有卖大烟的，白布棚卖饭的，十分热闹，上下有二里多长。周围附近人都来赶会，每天有数万人。我们家会期添客数十人，四乡亲戚来赶会，在我家吃住。白土岗街东西两头都出会，有大鼓铜锣（即锣鼓），一般有高跷、狮子、旱船、大头和尚、司衙子官等各种玩艺，每天下午上会，十分热闹。

白土岗街我记事起驻过两次建国军，两个团，别廷芳的自治团二十六团自卫队和乡公所的乡丁联防队，经常有武装部队驻扎。管辖区周围数十里，大部分是山区。

南召、鲁山的人很野，有民间造枪厂，老百姓和地主大部分都有私有枪支子弹。那些年代都有大杆土匪数万人集结，我记得有张杨团魏国柱、李长有、老王太，都是建国军变为土匪的。

当时法律不严，经常打死人。被打死也没人告状，就互相报仇，你打死我，我打死你。我记得抗战开始刘峙、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北被打垮后，稍微整顿以后开到南召山区白土岗附近整训。可是汤恩伯的十三军某师在白土岗纪律很坏，买东西不给钱，欺侮老百姓，老百姓气愤不过，起来把十三军一个师的枪收了，也打死不少当兵的。建国军在那里也被打死不少。老百姓采取游击战，建国军在明处，老百姓在暗处，去军队多，跑了，去人少就跟他打。次次都把军队打败，使他们站不住脚，自动走了。

我家是佃农，种地主的五亩旱地二亩菜园，我们那里和地主是对半分，秸秆也与地主分。种地主地先出租地押金，数十元银洋。每年还要给地主做零活，如洗衣磨面，他起房盖屋给他做工等。一般地主连饭也不管，给他干活吃自己的，工伤事故他们不管。

我家四口人，冬天天短吃二顿，仅够吃。我们老家听说是在陈州，由于爷爷在家有人命，逃到南召白土岗附近。爷字辈儿，我没见过面，只有父字辈我见到。我父亲排行十三，父字辈最小，到我这一辈儿兄弟，陈家二十多人，也是我和我弟弟最小。我们十三家居住在二十里以内，都是穷人佃户。

穷人种一辈地受一辈苦，一辈子受人欺压，永远不能翻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我母亲叫我上学。但我上学和别人不同，属于半农半学，每天上学前担水，下学后担粪干家务活，星期天别的同学去玩而我上山拾柴，寒暑假要帮家种地干活。到我十五六岁时，要

到煤窑去挑煤，每次可担六十斤，挣脚力钱。因为我家太穷，可以补助家中困难。学校不收我的学费，可想而知我家中困难穷苦的情形。

入党前后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南侵犯，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及各个大学的学生分赴大后方，做抗日救亡工作。我在南召白土岗的县立五小读高小时，先到我们学校教书的二位先生，一位是南京交大的徐近先生，另一位河南大学刘涛先生，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到校后几天，先开群众大会，报告目前政治形势，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野心，讲凡是日本占领地区，烧杀奸污妇女，杀害民众十分惨忍，想灭亡中国。为了我们不当亡国奴，全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奋起抗战，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为了唤起民众，他们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宣传，出大字报，演街头话剧等。为了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学校创办夜校、民众识字班。白土岗人们白天劳动，没有读书的识字机会，就夜间到学校读书识字，在课堂上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在开办夜校之前，徐、刘二位先生叫我帮办夜校民众识字班。那时没有电灯，叫我借汽灯。在白土岗街宣传民众上夜校的好处，人们能识字，又能得到知识。我白天晚上有空时，就到各家宣传动员，第一星期我就动员来六十人，第二星期动员百多人。先办了三个班，又组织开展战时服务团，我是首先参加的。1937年徐近先生看我办事积极，秘密的叫我参加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是共青团前身），并指示我把高小同学和农民识字班的积极分子介绍参加民先队。在街上和街外农民怕外人怀疑，徐先生说用旧社会的风俗方式，以拜把子兄弟换贴办法，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壮大了民先队。

自从义务开办民众识字班夜校及战时服务团，进一步发展民先队，白土岗的老百姓，对学校义务办学十分称赞。课本是学校发的不要钱，人们能识字不花一分钱，我半年来的工作，不管黑夜白天，都是义务进行工作。

徐近先生看我家中贫寒，对工作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怨言，并且都很愉快接受完成，徐先生对我进一步启发教育。1938年10月，徐先生和我在关帝庙中，领我宣誓，把我第一个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给我看共产党章程和党的基础知识，不断对我进行教育：工人穷人只有依靠共产党革命成功，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阶级，工人贫苦人民才能翻身，贫农才能有自己的土地耕种，工人才能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我从此参加革命队伍，先后介绍杨怀庆、魏宏武、李树钦等四人人党，并担任党小组长。

我有个表哥郭画匠，他一年四季画神像，同时用泥土麻杆及麻做神像神胎，土地爷、火神爷、阎王爷等神像，放到庙里供人去烧香拜佛去敬神。真神灵的话，神会叫他先富起来，可是他十分穷困，经常吃上顿没下顿。

在徐先生的教育下，我明白了迷信是假的，幻想不能实现，只有实心实意的去干革命工作，才能翻身。1938年革命工作是秘密的活动，开会一般在晚上，都不叫人们知道，哪里没有人去就到哪里开会。我召集开会选在南坡根太山庙一个山窝里，那里是个乱葬坟，也是穷人和无头案死人埋葬的地方，所以一般人都觉得乱葬坟可怕，不到那里去，尤其晚上更没有人去。我就举个例子说我表兄郭画匠，成天做神胎和画神像，按说他该有办法，可是他穷的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所以没有鬼神，不要怕，党开会我先到。大家认识到没有神鬼，以后就经常到乱葬坟去开党的会议。

1939年初春，县党组织保送十名党员去确山县竹沟中原局党校学习，我和刘涛、李吉祥等都在其中。同年结业后，派回白土岗。我在白土岗的宛中二院一面上学，一面在中小学中发展党的地下

组织。在党支部中刘涛是支部书记，我是负责农民武装的军事委员，还担任区委交通员和徐近的交通员，我负责联络的有：花子岭大庄小学朱宝林（后改名朱晓山，解放后首任南阳地区行署副专员）；南河店柏林庵小学李依仁（后改名李杰，解放后曾任南阳商业局长）；李青店背阴坡的尹怀春。经我介绍入党的魏宏武，1940年随徐近到新四军中，历任连长、营教导员、团长、师长、军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文革中病故于北京；杨怀庆被捕后坚贞不屈，在西北集中营被折磨至死；李树钦解放后任贵州省某县副县长。也有背叛的，也有消极的，最痛心的是把我培养介绍入党的徐近先生，调回新四军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在清剿中被捕

1942年7月7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五周年纪念日，可我在一个月以前就病了。在7月7日这一天，学校先生李介祉派人去找我到校外写标语，准备开纪念大会。由于我的病刚好，不能支持太久，我不能参加会议，就提前回家休息。学校先生和同学们正筹备开会，有一营国民党武装跑步包围了学校，前后各有机枪对着，只准进不准出，房上墙上都用枪对准学校，有一连人在校内检查，也有少部分到学生家里检查。这时有人给我家送信儿，说学校被包围抓人，要我立即躲避。我即从小巷出寨门，从庄稼地里偷跑到乡下亲戚家藏起来，到下午有人给我送信说，来学校清剿的是河南省保安军，在学校检查出书本、杂志，把学校先生和学生捆绑了二、三十个，用绳拴了两大串押走了，还留有特务便衣继续抓捕。后来听说，是白土岗街教育厅办的中山民校，校长姚兴甫是中统特务（解放后已枪毙）向上报的密，请国民党河南党部特务机关，立即派军队来清剿。所抓捕的共产党员，都交南召县监狱看守所扣押，由中统特务审讯。

而我逃到山区远方亲戚家，又不能长住在一家，要经常轮换着住，不管风里雨里白天夜晚有什么消息即刻迁移。由于在外逃避，天寒，饭食生冷的关系，时久而得一种痢疾，一天一夜大便无数，又不住地疼，在外治不好，痢疾使人十分瘦弱，一天不胜一天，有生命危险之忧。我母亲听我表姑夫说，痢疾病抽大烟可以治好，家里夜间偷偷把我叫回来藏到表姑夫家，一日三次，一次三口，进行治疗，三天就有效，治到五天基本好了。白土岗街是县三区所在地，后改为乡公所，山区管七、八十里远。乡长李振堂，听说他也是地下党员，他看国民党部队抓人，势力大，为了保住他乡长的官帽，就投靠了中统特务。8月8日天不明他派人把我抓走，押到乡公所。又派人抓周炳坤的父亲周六伯，因抓不到周炳坤，把他父亲抓去押作人质，叫家里把儿子找着送去，他父亲才能放回。二天后，我同周六伯被押送到县城。白土岗距老南召县城九十里，8月10日因是夏天，天长，八点多天才黑，而我病刚好点，身体仍很虚弱，走路还很困难，到前半夜才到县城。我俩被分开扣押，周六伯到监狱，我到看守所。进了看守所大门和二道门，是关犯人的院，我一进院，三个监房听说有人来，都到门口来看我，都赤身没有穿一件衣裳，有的头发很长，我没进屋就很害怕。牢门开开后我进到屋里，有人介绍说犯人队长叫朱顺海，是老无期。队长管三个组长，我住上屋，同朱队长住一个房。每屋有组长，组长也是十五年以上徒刑，队长和组长可以随便打人，如果人穿的好些，队长看得起，少挨打。凡是新进去的人，必须先交香钱、油钱，因为尿桶（可以大便）在屋内放，晚上要点香才能防臭气臭味；油钱因为屋里晚上要点灯。凡刚被抓去的人，头一天要睡到靠近尿粪桶的地方。再去人，那后去的得睡到靠近尿桶边，先来的可以依次向后移动。如果不来新犯人，你要一直等到添人，才能向后移。我想这样很公平，钱都得出，都能按次序排列，没有说论人高低贵贱而分等级。

天明把三个房的门都开锁，犯人都可到厕所大小便，各类犯